



中国编辑思想发展史

（下卷）

吴平 钱荣贵 主编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中国编辑思想发展史

(下卷)



吴平 钱荣贵 主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编辑思想发展史》（上、中、下卷）

撰稿人名单

总 论	吴 平
第一章 第二章	钱荣贵
第三章	段乐川
第四章	芦珊珊
第五章	李 乐
第六章	徐 媛
第七章 第八章	胡程立
第九章 第十章	向 敏

目 录

下卷：明清、民国

第七章 明代的编辑思想·····	783
第一节 明代编辑活动的背景和特点·····	784
一、明代编辑出版业发展的背景·····	784
二、明代编辑活动的特点·····	785
第二节 “敬天，忠君，孝亲”——明代“制书”的编撰·····	789
一、“制书”的编纂意图·····	790
二、“敬天、忠君、孝亲”——“制书”编辑的指导思想·····	792
三、对明代“制书”的评价·····	798
第三节 “大一统之制作”——明代类书《永乐大典》的 编辑思想·····	799
一、明代类书编辑与儒家文化·····	799
二、《永乐大典》产生的历史条件·····	802
三、《永乐大典》的编辑理念：标榜文治·····	805
四、《永乐大典》的编辑体例：“用韵以统字，用字	

以系事”	810
五、《永乐大典》的编辑特色	813
六、《永乐大典》的历史地位	815
第四节 “以称昭代右文之治”——明代史书的编撰	815
一、官方修史的没落	816
二、《明实录》的编辑思想	819
三、私人修史的勃兴	823
四、明代方志的编撰	832
第五节 经世致用——“经世文编”的编辑思想	840
一、“经世文编”现象的社会根源	841
二、经世思潮的思想内核	842
三、明代刊行的“经世文编”	844
四、陈子龙经世致用的编辑思想	848
五、经世致用编辑思想的历史地位	855
第六节 “实有益于民生日用”——明代科技书籍的 编辑思想	856
一、明代科技图书编纂兴盛的思想基础	856
二、翻译、会通到超胜——徐光启的编辑思想	859
三、“贵五谷而贱金玉”——《天工开物》的编撰思想	867
四、“纲举目张”——《本草纲目》的编辑思想	872
五、晚明西欧科技书籍的编译活动	877
第七节 “为市井细民写心”——通俗文学的编辑思想	884
一、通俗文学读物兴起的背景	885
二、冯梦龙的编辑思想	888
三、凌濛初的编辑思想	896
第八章 清前期编辑思想	903
第一节 清前期编辑出版业发展的背景和特点	903
一、清前期的文化政策	904
二、清前期编辑出版活动的特点	907
第二节 《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的编辑思想	909

一、《古今图书集成》的编辑思想	909
二、《四库全书》的编辑思想	915
第三节 清代史籍与方志的编辑思想	919
一、稽古定制：清代官修史籍的总体指导思想	919
二、万斯同《明史》修纂思想	920
三、清代方志的编撰	925
第四节 章学诚与图书编撰学	929
一、章学诚的图书编撰学理论与实践	929
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的书目编撰理论	930
三、切合当时人事——章学诚的史籍编辑思想	933
四、以史入志——章学诚的方志编纂思想	936
第五节 清代图书辑佚的发展	940
一、清代辑佚的思想根源	941
二、清儒辑佚的方法	944
三、马国翰与《玉函山房辑佚书》	947
四、严可均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951
第九章 晚清时期的编辑思想	956
第一节 晚清基督教传教士的编辑思想	957
一、以文辅教的思想	957
二、“悦读”的思想	959
三、统一的思想	968
四、版权保护的思想	971
第二节 早期先进中国人编辑思想研究	974
一、经世思想	975
二、以“悉夷情”为要务	977
三、“以西洋人谭西洋”	983
四、“地理非图不明”	986
第三节 洋务运动时期编辑思想研究	989
一、“固旧”的思想	990
二、“开新”的思想	994

三、“但求雠校之精审，不问成书之迟速”	999
第四节 晚清改良派编辑思想研究	1005
一、重视报刊的作用	1005
二、重视编辑素养，以求自张其军	1009
三、“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	1013
四、晚清改良派的翻译思想	1015
第十章 民国时期的编辑思想	1022
第一节 鸳鸯蝴蝶派文人编辑思想研究	1023
一、迎合读者的思想	1024
二、追求消闲的思想	1027
三、谏诤微讽的思想	1030
第二节 《新青年》同人编辑思想研究	1038
一、以塑造新青年为目标	1038
二、策划的思想	1042
三、为读者服务的思想	1048
四、“不容他人匡正”的思想	1049
第三节 张元济编辑思想研究	1052
一、昌明教育之思想	1052
二、融会新知的思想	1056
三、为古人薪续命之思想	1058
四、倚仗群才的思想	1062
第四节 王云五编辑思想研究	1065
一、扶助教育的思想	1065
二、经营的思想	1067
三、“己所欲则施诸人”的思想	1068
四、“不断的以新书贡献于读书界”的思想	1071
第五节 开明人的编辑思想	1074
一、将“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年”作为服务对象	1075
二、求进弗锐的思想	1082
三、创新的思想	1086

四、关心作者	1090
第六节 鲁迅编辑思想研究	1093
一、主旨唯在益人	1093
二、成熟的编辑战斗思想	1096
三、重视编辑质量	1102
四、甘当“腐草”，关爱青年	1107
第七节 邹韬奋编辑思想研究	1109
一、“痴干”的思想	1110
二、大众化的思想	1115
三、创新的思想	1119
四、为读者服务的思想	1126
主要参考文献	1131

第七章

明代的编辑思想

明代是我国编辑思想史上最活跃最具个性的时代。洪武一朝，朱元璋下令编纂了大量“制书”，体现了皇权政治对出版的强制干预。《永乐大典》“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辑体例，完整保存了大量古籍，成为明王朝政治和文化高度完善走向成熟的标志。史书的编撰呈现出官修史书没落和私修史书勃兴两种形态。官修史书以政治鉴戒为编辑宗旨，而私修史书既要补国史之失，又要实现史家“以史经世”的目的。方志的修纂表现出统治阶级浓厚的巩固政权和资政的意识，并且在体例上有所创新和发展。中叶以后，一批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以编辑“经世文”表达改革精神和救世思想。在实学思潮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晚明学者以“务实重民”为总体指导思想，迎来了科技著作编撰的高潮。伴随市民阶层的兴起，以冯梦龙、凌濛初为代表的编辑家“为市井细民写心”，以浅、俗、真的作品来启迪民智。

第一节 明代编辑活动的背景和特点

一、明代编辑出版业发展的背景

(一) 经济繁荣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明朝之初,太祖朱元璋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根据这个指导思想,他移民垦殖,实行军屯,奖励农耕,解放匠户,支持商业,减轻赋税,措施都颇为得当有效。经过这样一番努力之后,全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人口和赋税都有了增加,国库充足,国力日增。因此,在明初六七十年间,社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并逐渐繁荣起来。

明代中期以后经济畸形发展,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批农民倾家荡产后流入城镇,为手工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据记载,当时仅苏州就有出卖劳力的织工、染工一万多人。城镇劳动力的充沛为发展包括刻书业在内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条件,资本主义开始萌芽。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其地域性分工也逐渐明显,如丝织业中心在苏州,棉织业中心在松江,染业中心在芜湖,瓷器业中心在景德镇。全国还出现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扬州、福州、武昌、南昌、广州、桂林等20多个大商业中心。明代农业、工业、商业的发展,为图书事业的繁荣打下了物质基础。价廉易得的劳动力,也使刻书成本大降而赢利日渐可观,为出版业发展提供了人力和经济动力。

(二) 统治者对文化事业的重视

为了加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明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朱元璋建国第二年(1369年)就诏谕中书省设立郡学,自此,全国各府州县皆先后设立儒学,并规定各地学校以孔子所定经书海诸生。大力推崇《四书》、《五经》,制订八股取士制度,营造礼贤馆于应天,招聘贤能之士并给予优厚的待遇。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促使图书事业兴盛。为了发展图书出版事业,统治者实行了特殊的政策。洪武元年八月,明太祖下诏除书籍税,并于同年命有司

博求古今书籍。这一免税政策贯彻明代始终，它对图书出版事业无疑是持久而有效的兴奋剂。因此，明代上上下下都以藏书为贵、刻书为荣，该时期官僚士大夫阶层普遍喜好藏书，以示风雅，江浙闽赣到处建起藏书楼。将书作为一种礼物送人遂成为一种时尚，“书帕本”、“巾箱本”在官场中风靡一时，由于刻书拥有众多的主顾、广阔的市场，以卖书为业的坊肆遍布全国。

（三）造纸、印刷技术的提高

随着手工业的发展，明代造纸技术也有很大提高。据《天工开物》记载，明代在制造竹纸、皮纸等各种纸张的选料、配料方法和工艺等方面都有创新和进步。明代图书多用竹纸、棉纸印造。当时生产的竹纸虽薄而易老化，但不易受虫蛀。生产的棉纸莹洁，有如玉版，韧性极强，宜于收藏。精巧的造纸技术，生产出了高质量的纸张，为刻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印刷术自唐代发明之后，到明代已有六七百年历史，其间雕版印刷事业从未中断，技术日趋成熟。明代专门从事刻印业的人才数以千万，一支雕版印刷队伍已经形成。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明代的出版事业开始了新的发展。

可以说，明代是我国古代出版史上最为活跃、最具个性的时期，与前代相比，这一历史时期出版业最显著的特点是私人出版商蜂起中土。书坊林立，出版业被注入更为浓烈的商品经济意识。书籍贸易在更大的范围，以更壮观的规模和更激烈的竞争形式空前活跃地展开。

二、明代编辑活动的特点

（一）图书的种类和体例极为丰富

从图书编辑的角度看，明代有不少新的发展。经部图书方面，和前代一样，出现了不少校正原本、注释训诂、阐明经义的著作。史部图书除了照例完成前朝元代的正史之外，又增加了宋、元、金三部断代史，正史从17种增至21种，其他各种体裁的史书也出版了许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地方志的编纂，朝廷多次颁发编写体例，从中央的《一统志》，到各级地方政府，都编写齐全，蔚为大

观。在子部图书中,科学图书的编撰更是前所未有。《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被称为“三大科学巨著”,这三部书就体定例,详尽精审,倡导实证方法,具有科学巨著的恢弘气派和不朽作用。在科学图书的编辑出版方面,明代学者还和西方学者一道,编译了200多种科学书籍,内容涉及基础学科和各种应用科学,翻译的方法多种多样,有严格的直译,也有编译、选译、译著、译述等。这些图书在当时以及后来的清朝,大多产生了实际作用,用来编制历书,绘制地图,制造机械。这些图书发挥了中国科学和世界科学接轨的作用。子书中特别为人津津乐道的则为小说和戏剧的编纂,“三言二拍”之类的小说总集,《元曲选》、《六十种曲》之类的戏剧汇编,以及各种单种剧本和折子戏选本,满足了广大读者的需求。在集部中,各种各样文体的总集、别集、选集,林林总总,显示了文学创作的盛况。

从世界的编辑出版史来看,图书的种类和体例是逐步发展并积淀起来的。最初的哲学书大多是语录体、对话体,最初的史书大多是编年体、文献汇编或史诗,最初的文学书大多是诗歌汇编,图书的体例只是有限的几种。我国的图书体例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积淀、丰富的过程。万历年间,焦竑编的《国史经籍志》中,在制书、经、史、子、集五大类之下,分成50个子目,子目下再分细目、小目,共有4级,终端子目共有342个之多。这种细密的多级目录,说明了明代图书品种繁多,形式多样,体例富有变化。今天图书的各种体例,在明代已经能够运用自如,或者已经具有雏形。

明代图书种类和体例的丰富,还可以从类书、丛书、选本上看出。明代出版了类书之最《永乐大典》,出版了各种类型的丛书,出版了各种角度的选本。这些,都反映了由于知识的极大丰富,产生了系统化和优选化的需要。

(二)编辑活动与皇权政治联系紧密

明代社会所发生的大小政治事件,在编辑活动中都有所反映,显示了皇权政治对编辑出版事业的介入。出版物或者在事情发生之前起着风雨欲来的前兆作用;或者在激烈的斗争过程中被用作有力的武器;或者在事情已经过去之后追记经过,评论功过,余

波不绝。

明初期的思想文化工作，紧紧围绕着建立和巩固皇朝统治服务，尊崇儒家思想，修撰前代历史，完善科举制度，确立八股文体式。这一切，都带有强烈的巩固皇朝政权的色彩。

明开国之初大量“制书”的编辑出版，发挥了巩固皇朝统治，教诲皇子臣下，打击叛臣逆将的作用。这类书籍训诫对象广泛，上自君主、皇后，下至功臣、文官、武将，亲如太子、诸王、外戚，疏如庶民、工商，无不陷入这些书籍布置的训诫网罗。“制书”的编撰宗旨不外乎“敬天、忠君、孝亲”。这说明书籍的鉴戒功能已经得到了皇权政治的强化利用。这类大规模“制书”的编纂在历代是绝无仅有的，上层统治者利用“制书”为自己服务，书籍的教化、鉴戒功能发挥备至，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出版与政治相连的极致。

为了标榜皇朝文事之盛，收服人心，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下令编纂“大一统之制作”——《永乐大典》。明成祖修《永乐大典》的用意，是想显示庞大帝国的实力，为自己在文化史上树一座丰碑，同时笼络当代文人学者，借此巩固其篡夺得来的政权。除此之外，永乐帝为了把这次夺权披上遮羞布，命李景隆等重修《太祖实录》。这也是编辑活动与皇权政治联系紧密的例证。

除了以上重大的政治事件之外，其他如胡蓝之狱、东林党议、沿海倭乱、辽左兵端等，都有相应的出版物出版，其形式有史书、实录、奏议、野史、小说、戏剧等。可以说，明代政治斗争中的双方都十分懂得运用出版这个武器。

（三）思想新潮推动编辑事业发展

明代奉行的是儒学，儒学的经典是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既是哲学的原则和理论基础，又是经世治国和制定一切政策法规的依据，以及选拔任用人才的准则，也是道德伦理的归宿。总之，举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行为，都以儒家经典为准绳，都要到四书五经中寻找出处。

对四书五经的解释，汉唐时着重在考据训诂方面，力求弄清楚它的本义，称为“汉学”，又称“朴学”；宋元时则着力在弄清其义理，即所谓微言大义，称为“宋学”，又称为“理学”。汉学和理学，

成为解释儒家经典的互相对立的两大门户。宋代的理学,经过元代的广泛传播,在明代继续获得新的发展,特别是王守仁的心学,把理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今人称之为“宋明理学”。

明代思想界十分活跃,从理学、心学发展到离经叛道的种种异端出现。儒家学说既有保守、禁锢的一面,又有仁政、爱人等内容,把这些积极内容进行合理推导,可以得出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的新思潮,使传统儒学萌发出新芽。它们虽然同出一源,最后却成了“异端”。明代思想界经历了从“同源”到“异端”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编辑活动发挥了记录、推进和传播的作用。

(四) 市民读者群体的孕育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城市的发展,城市居民也日益增多。人们的思想、习惯、风俗、价值取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的人对社会的丕变已经有强烈的感受,不少著作中指出,世风追求华丽,金钱的作用被抬得很高,科举、做官、社交、人生价值、人际关系,都涂上了金钱的色彩;思想上出现了“异端”,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对人性的追求,呼唤人的平等、男女的平等和真诚的爱情。当市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一定的满足之后,就会对文化生活提出相应的或更高的要求,于是戏曲、小说等市民文学和工艺美术作品便大量产生。这就为图书的出版提供了丰富的稿源和广阔的市场。明代通俗文学书籍的编辑出版取得了巨大成就。仅从《中国丛书综录》来看,收明代小说丛书 24 种,戏曲丛书 23 种,在明代各类丛书中,数量最多。明代各种不同的藏书目录,大多著有通俗文学目录,如《宝文堂书目》设“事杂”、“乐府”类,其中收有大量的元明话本、小说、杂剧、传奇书目。各地坊刻,多有刻戏曲、小说的。这种以“市井细民”为主要读者和观众的明代“俗文学”,是对唐宋传奇、宋元话本、元杂剧等文学形式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的繁荣打破了鄙视通俗文学的旧有传统,开辟了中国编辑出版事业的新局面。

(五) 编辑出版家群体的出现

明代出版技术的进步、商品经济的繁荣、刻书事业的兴盛,催生了一批具有近代启蒙意义的编辑出版家群体。他们往往既是经营

书坊的老板,又是该书坊的职业编辑,大多聚集在编辑出版业发达的江南地区,以藏书、编书、刻书为业,在出版经营上兼具市场意识和文化追求,是近代职业编辑出版家的前身。其中,著名的有吴勉学、陈仁锡、胡文焕、毛晋、冯梦龙、凌濛初等人。最具代表性的是既儒且商的编辑出版家毛晋,他经手编校出版的书籍,数量之多超过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独立经营的出版商,而质量之好,又足以与宋刻媲美。毛晋从青年时代开始迷上编辑出版事业,一生坚持读书、藏书、编辑、出版,自明万历至清顺治40多年间,从未间断,共编辑、出版了600多种书,四部俱备,应有尽有,大部头的宏伟巨制有《六十种曲》、《宋六十名家词》、《十三经注疏》、《十七史》、《文选李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津逮秘书》等。可以说,毛晋的一生都献给了编辑出版事业。明代编辑出版家群体的出现说明古典编辑活动经历了一个从古典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编辑出版业的市场化应该是有渊源的。

(六) 图书编撰理论的总结

明代是图书编辑出版活动的兴盛时期,著作数量极多,加上考据学的发展,有些学者承袭考据学的传统,在古代文献整理、目录学、文献学上取得了成绩。他们不一定编辑出版了具有代表性的编辑成果,但是在他们的著述中对图书编撰理论的思考比前代更深入、更透彻,为清代图书编撰理论的成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中著名的有杨慎、王世贞、焦竑、陈第、宋濂、胡应麟、钱谦益等,关于图书编撰理论的见解与主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史书编撰;(2)关于图书编撰史;(3)关于书目编撰;(4)关于辨伪和辑佚。

第二节 “敬天,忠君,孝亲” ——明代“制书”的编撰

明太祖朱元璋自起兵反元,至统一天下的三十余年,非常注重古今史事对现实政治的鉴戒作用,在“以猛治国”的同时,并重教化,大兴文治。在洪武一朝,朱元璋下令編集纂修了大量图

书,如修《元史》、纂《洪武正韵》等书,其中以古今史事教诲和儆戒世人的书,占了很大比例,编修之频繁、成书数量之多,为历代各王朝所罕见。其意义和作用远远超出“以史为鉴”的内容,对明代政治、文化诸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代出版的图书目录中,常把这一类书放在最前面,居经史子集之首,其名称不一。正统六年(1441年)编成的《文渊阁书目》中把这类书放在“天字第一号”橱中,标题为“国朝”,著录91种。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编成的《内阁藏书目录》把这类书称为“圣制部”,著录150种,增加了60种,但其中并不完全是明代皇帝的诰諭。《秘阁书目》称为“本朝”,著录114种。《行人司书目》称为“典故类”,著录92种。收录得比较完备的是焦竑的《国史经籍志》,他把这些书称为“制书”,著录238种。^①这一不寻常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并予以探讨。

所谓“制书”,是皇帝命令的一种。据《康熙字典》对“制书”的解释:“天子之言曰制书,谓为制度之命也。又成法曰制。”自周代开始,制书就成为历代皇帝颁布命令和法律制度的文件。唯有明代制书常被单列一类,放于图书目录的最前面,居经史子集之首,虽然其名称不一,但足以彰显制书的特殊历史地位。到了清代,取消了“制书”、“天字第一号”等特殊地位,各归入经史子集的有关门类中。明代“制书”的编辑,从修书的目的宗旨,到修书人选,成书颁赐,都是御定,完全控制在皇帝一人之手,彻头彻尾的是皇帝个人意志的体现。研究明代制书的编纂可以最清楚地了解统治阶级是如何利用出版这个工具的。

一、“制书”的编纂意图

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任何思想无不烙有时代的印记,无不反映思想者的意图和立场。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必然利用各种形式来灌输自己的思想。明代帝王的思想折射到编辑出版领

^① 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域，即表现为朱元璋等明初几位皇帝十分懂得并善用出版这个工具，大量编纂“制书”，用它来宣扬皇朝武功文治之盛，教育子孙，训诫文武，惩恶扬善，达到齐一民心，统一思想，巩固皇朝统治的目的。

（一）体现御天下之权术

近代学者李晋华在《明代敕撰书考》中指出，明太祖敕撰的“制书”，其内容主要都有历史取向的特色，大多数也以史书所载的人物和事情为内容，并且不离以史为鉴的原则，充分体现了他重视具体事情的说服力。以史为鉴的潜在理据是传统王朝的正统思想。正因为明太祖视明朝为一个正当地继承历代正统的王朝，所以在与帝王和帝国有关的规制上，都需要寻求历史先例的支持。尤其是明太祖所敕撰的，均为“戒其子孙如何宰治天下，文武诸臣如何事君，士庶如何守法之用意”。

（二）士大夫政治萌芽的扼杀

经宋末皇极腐败之冲击和元蒙游牧文化之洗礼的士大夫，终于迎来了一个新的汉民族皇极政权，当隐逸以待时日的士大夫们正欲展其抱负而一新天下之际，没想到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场噩梦。法国学者谢和耐说：“明帝国是由一名农民创建的，他对于文化阶级似乎表现出了一种本能的不信任。”^①廖可斌先生又进而申发此意说：

明王朝是一个地地道道由农民起义军建立的王朝。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多由农民起义等原因引起，但最后建立新王朝的，却往往是乘机专权的与旧王朝有密切关系的大贵族，如魏、晋、南朝宋、齐、梁、陈及隋、唐、宋等。这些新王朝的统治者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并与在旧王朝供职的士大夫关系密切，往往要靠这些人的支持夺取政权。因此在建立新王朝后，往往对之采取有容政策。明王朝则不然，它完全是一个

^① 谢和耐著，耿升译：《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